

在哈瓦那憑甲華裔將軍

外交圈

進入二〇一六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短期間住，趁便，去憑弔了一位華裔老朋友，回憶二十多年前同他結下的深厚友情。

朋友的父母是廣東增城人，為謀生，早年去古巴從事「苦力型」勞動，生有五個孩子，他是其中之一。他出生後，按照古巴人的習慣，取名莫伊塞斯，但打破古巴人將父母的姓分寫作姓的常規，而將父母的姓「邵」和「黃」連寫合併，全名為莫伊塞斯·邵黃。長大後，由於不滿當時的賣國獨裁政府的統治，投身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鬥爭，在游擊隊司令部負責給養工作。取得革命勝利後，長期擔任勞爾·卡斯特羅副主席的辦公室主任之職，後被任命為國家物資儲備局局長，成為部長級閣員，負責國家和軍隊的物資供應事宜。古巴軍隊開始授銜時，他是首批被授予少將銜的軍隊領導人之一。其後，又被推舉為古巴中國友好協會會長，同時兼任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的古巴中國友好議員小組主席。他來中國時，中文名片上印有「邵正和」字樣，我不知這個名字是否與他在中國的族譜有關。

我認識邵黃，是在哈瓦那的機場上。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從厄瓜多爾調職去古巴，他代表古巴方面在機場迎接，從此開始了兩人的友誼。在古巴的兩年裏，我得到過他的許多重要幫助和深度支持。我和卡斯特羅主席、勞爾副主席的許多次來往，都是他協助聯繫和安排的，幾乎每次也都在座作陪。他還經常陪同我來往古巴的各個省市，了解古巴的情況，或介紹中國的國情，近處乘汽車往返，遠處則常常動用勞爾的專機。他將我送給他的中國黃瓜種子在物資局的園地裏種植並迅速在哈瓦那周邊幾個省推廣，形成了古巴的一個新蔬菜品種：「徐貽聽黃瓜」。它在古巴的被命名，可以說是邵黃一手操辦的，我卻享受到了中古關係中的一個積極成果。此外，遵照勞爾的建議，在他和我之間曾經有過一次小範圍的「廚藝比賽」，裁判長是卡斯特羅主席，成員有勞爾以及另外五名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此項比賽中，我們共舉行過五次宴請活動，由邵黃的姐姐和使館的廚師分別出任大廚，「比賽」雖因我離任而無最終結果，但盛況應屬空前絕後。

順便還想提到的是，邵黃生於一九三八年，當時中國使館的政務參贊林良由和我也都生於那一年，邵黃年長我一個月，我比林良由參贊大兩個月，三人平常往來頻繁，關係密切，接觸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所以被戲稱為哈瓦那的「三虎幫」，就連卡斯特羅主席對此亦有所聞。遺憾的是，如今「三虎」中已有兩虎離世，只剩我一個「孤虎獨踞」了。

邵黃是出生和成長在古巴的中國人後裔，對華態度友好，也一直在推動古巴與中國友好關係的發展。他曾經多次訪問中國，對中國的感情溢於言表。五年前不幸因病去世，臨終前還留言將部分骨灰安葬於其祖籍增城。我聞到噩耗，痛徹心扉；知其遺言，更肅然起敬。幾年來，一直懷有向他表達敬意和哀思的願望，但千里迢迢，願望至今方得以實現，真的感到情感上的彌補和滿足。

在他的夫人伊雷內於家中為他設立的靈堂前，我默默地表達了敬意和哀悼，祝願他一路走好。我還告訴他，古巴和中國的關係發展良好，被中國領導人稱之為「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這裏面應該有他的功勞，中國和古巴人民都不會忘記。

老朋友邵黃將軍，我會永遠懷念您！

徐貽聰

像章和語錄

嚴 阳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已經定居揚州的姨媽回到家鄉，她在整理舊物的時候，從老式衣櫥的隔板下，取出了一包叮噹作響的東西：領袖像章。這些像章，大都是鋁質的，小的只有人民幣五分錢的硬幣那麼大，大的則有小飯碗口那麼大。瞅着後者，我有些吃驚，也有些羨慕。為什麼？因為再往前推差不多二十年前的時候，假如我能夠擁有這其中的一枚，那麼，必定會無限風光，成為衆人矚目的焦點。

「文革」初期，曾經有過一陣像章熱：無論男女老少，都以胸前能夠別一枚像章為榮。起初，金屬材料製作的領袖像章還很罕見，我母親單位有人因此而發明了拿牙刷的刷身磨平，拿小刀刻上「為人民服務」一類的字樣充作胸章，竟然也能時髦與風光；後來，金屬材質製作的領袖像章幾乎於一夜之間普及開來，牙刷製品自然再也無人光顧了。這時候的人們追求的是什麼？是更大的像章。而那些像章上的領袖頭像其實主要也就兩種：一種是領袖的側面頭像——應該是他六十開外時身着中山裝的頭像；另一種則是他老人家頭戴軍帽，「文革」期間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百萬紅衛兵的照片中的那個頭像。

讓人有些難以思議的是，那時候的人們的審美眼光高度趨同：都是以大為美。所以，有了人民幣五分錢硬幣大的像章以後，會積極追求藥瓶蓋子大的像章；有了藥瓶蓋子大的像章，又會努力追求小飯碗口大的像章。而因為似乎市面上很少大尺寸的像章出售，所以，一些人竟然採取了極端的方式攫取：搶。也就是當某人胸前佩戴着碩大的像章出現在公共場所如電影院、商店、街道上的時候，於不經意間可能有人從天而降，急速從你胸前「掠」走像章。同樣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那個年代的人們，似乎並不認為這是屬於犯罪性質的搶劫行為。或許大家的想法是，之所以「搶」，是因為「愛」；而愛偉大領袖，又怎麼能是罪行呢？

與那時人人胸前佩戴一枚大小不等的領袖像章相同的是，那時候的手一本領袖「語錄」。在那個塑膠製品還很少見的年代，「語錄本」早早地就穿上了漂亮的塑膠外套。我甚至直到今天一提起「語錄本」來，還能感覺到那「語錄套」的柔軟以及散發出的塑膠味。當然，「語錄本」上「副統帥」的「再版前言」也是我印象相當深刻的，記得它的第一節中，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推向頂峰」之句。而小冊子的第一條語錄，我記得它應該是這樣一條：「領導我們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當然，當年我記得的「語錄」絕不只是這一條，很多人，包括那些識不了幾個字甚至是純粹文盲的人，如工廠裏的工人，農村裏的社員等，能夠流利地背出其中不少「語錄」的也不在少數。為什麼？因為能不能背，背多與背少，據說與其政治立場和態度有一定的關聯的；還因為「文革」高峰時期，竟然有人發明了一個做法，以顯示自己的無限忠誠：攔在路上，讓過路人背誦一條領袖「語錄」，順利背出則讓通行；否則，一邊學習去，直到能夠背誦出來為止。而我還記得另一件事：在小學算術課本中，在涉及到百分數的例題或者習題裏，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去年某印刷廠印領袖「語錄」（「選集」）多少本，今年敬印多少本，今年比去年的印數增加百分之幾十？

讓人十分感嘆的是，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收藏熱漸起，但我們家竟然一枚像章和「語錄本」都找不到了！所以，在看到我姨媽將那一包像章從衣櫥隔板下方取出的時候，我非常驚訝。當今天回首往事，我還有其他一些感嘆，比如說，並非胸前別上像章，就真的一定「無限忠於」，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事實上大有人在；「語錄本」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等等一條條「語錄」清楚地寫着，一個人會背，能背又怎麼樣？一些人在現實生活中所作所為甚至與之截然相反！

◆◆◆◆◆

外交圈

進入二〇一六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短期間住，趁便，去憑弔了一位華裔老朋友，回憶二十多年前同他結下的深厚友情。

朋友的父母是廣東增城人，為謀生，早年去古巴從事「苦力型」勞動，生有五個孩子，他是其中之一。他出生後，按照古巴人的習慣，取名莫伊塞斯，但打破古巴人將父母的姓分寫作姓的常規，而將父母的姓「邵」和「黃」連寫合併，全名為莫伊塞斯·邵黃。長大後，由於不滿當時的賣國獨裁政府的統治，投身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鬥爭，在游擊隊司令部負責給養工作。取得革命勝利後，長期擔任勞爾·卡斯特羅副主席的辦公室主任之職，後被任命為國家物資儲備局局長，成為部長級閣員，負責國家和軍隊的物資供應事宜。古巴軍隊開始授銜時，他是首批被授予少將銜的軍隊領導人之一。其後，又被推舉為古巴中國友好協會會長，同時兼任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的古巴中國友好議員小組主席。他來中國時，中文名片上印有「邵正和」字樣，我不知這個名字是否與他在中國的族譜有關。

我認識邵黃，是在哈瓦那的機場上。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從厄瓜多爾調職去古巴，他代表古巴方面在機場迎接，從此開始了兩人的友誼。在古巴的兩年裏，我得到過他的許多重要幫助和深度支持。我和卡斯特羅主席、勞爾副主席的許多次來往，都是他協助聯繫和安排的，幾乎每次也都在座作陪。他還經常陪同我來往古巴的各個省市，了解古巴的情況，或介紹中國的國情，近處乘汽車往返，遠處則常常動用勞爾的專機。他將我送給他的中國黃瓜種子在物資局的園地裏種植並迅速在哈瓦那周邊幾個省推廣，形成了古巴的一個新蔬菜品種：「徐貽聽黃瓜」。它在古巴的被命名，可以說是邵黃一手操辦的，我卻享受到了中古關係中的一個積極成果。此外，遵照勞爾的建議，在他和我之間曾經有過一次小範圍的「廚藝比賽」，裁判長是卡斯特羅主席，成員有勞爾以及另外五名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此項比賽中，我們共舉行過五次宴請活動，由邵黃的姐姐和使館的廚師分別出任大廚，「比賽」雖因我離任而無最終結果，但盛況應屬空前絕後。

順便還想提到的是，邵黃生於一九三八年，當時中國使館的政務參贊林良由和我也都生於那一年，邵黃年長我一個月，我比林良由參贊大兩個月，三人平常往來頻繁，關係密切，接觸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所以被戲稱為哈瓦那的「三虎幫」，就連卡斯特羅主席對此亦有所聞。遺憾的是，如今「三虎」中已有兩虎離世，只剩我一個「孤虎獨踞」了。

邵黃是出生和成長在古巴的中國人後裔，對華態度友好，也一直在推動古巴與中國友好關係的發展。他曾經多次訪問中國，對中國的感情溢於言表。五年前不幸因病去世，臨終前還留言將部分骨灰安葬於其祖籍增城。我聞到噩耗，痛徹心扉；知其遺言，更肅然起敬。幾年來，一直懷有向他表達敬意和哀思的願望，但千里迢迢，願望至今方得以實現，真的感到情感上的彌補和滿足。

在他的夫人伊雷內於家中為他設立的靈堂前，我默默地表達了敬意和哀悼，祝願他一路走好。我還告訴他，古巴和中國的關係發展良好，被中國領導人稱之為「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這裏面應該有他的功勞，中國和古巴人民都不會忘記。

老朋友邵黃將軍，我會永遠懷念您！

徐貽聰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已經定居揚州的姨媽回到家鄉，她在整理舊物的時候，從老式衣櫥的隔板下，取出了一包叮噹作響的東西：領袖像章。這些像章，大都是鋁質的，小的只有人民幣五分錢的硬幣那麼大，大的則有小飯碗口那麼大。瞅着後者，我有些吃驚，也有些羨慕。為什麼？因為再往前推差不多二十年前的時候，假如我能夠擁有這其中的一枚，那麼，必定會無限風光，成為衆人矚目的焦點。

「文革」初期，曾經有過一陣像章熱：無論男女老少，都以胸前能夠別一枚像章為榮。起初，金屬材料製作的領袖像章還很罕見，我母親單位有人因此而發明了拿牙刷的刷身磨平，拿小刀刻上「為人民服務」一類的字樣充作胸章，竟然也能時髦與風光；後來，金屬材質製作的領袖像章幾乎於一夜之間普及開來，牙刷製品自然再也無人光顧了。這時候的人們追求的是什麼？是更大的像章。而那些像章上的領袖頭像其實主要也就兩種：一種是領袖的側面頭像——應該是他六十開外時身着中山裝的頭像；另一種則是他老人家頭戴軍帽，「文革」期間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百萬紅衛兵的照片中的那個頭像。

讓人有些難以思議的是，那時候的人們的審美眼光高度趨同：都是以大為美。所以，有了人民幣五分錢硬幣大的像章以後，會積極追求藥瓶蓋子大的像章；有了藥瓶蓋子大的像章，又會努力追求小飯碗口大的像章。而因為似乎市面上很少大尺寸的像章出售，所以，一些人竟然採取了極端的方式攫取：搶。也就是當某人胸前佩戴着碩大的像章出現在公共場所如電影院、商店、街道上的時候，於不經意間可能有人從天而降，急速從你胸前「掠」走像章。同樣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那個年代的人們，似乎並不認為這是屬於犯罪性質的搶劫行為。或許大家的想法是，之所以「搶」，是因為「愛」；而愛偉大領袖，又怎麼能是罪行呢？

與那時人人胸前佩戴一枚大小不等的領袖像章相同的是，那時候的手一本領袖「語錄」。在那個塑膠製品還很少見的年代，「語錄本」早早地就穿上了漂亮的塑膠外套。我甚至直到今天一提起「語錄本」來，還能感覺到那「語錄套」的柔軟以及散發出的塑膠味。當然，「語錄本」上「副統帥」的「再版前言」也是我印象相當深刻的，記得它的第一節中，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推向頂峰」之句。而小冊子的第一條語錄，我記得它應該是這樣一條：「領導我們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當然，當年我記得的「語錄」絕不只是這一條，很多人，包括那些識不了幾個字甚至是純粹文盲的人，如工廠裏的工人，農村裏的社員等，能夠流利地背出其中不少「語錄」的也不在少數。為什麼？因為能不能背，背多與背少，據說與其政治立場和態度有一定的關聯的；還因為「文革」高峰時期，竟然有人發明了一個做法，以顯示自己的無限忠誠：攔在路上，讓過路人背誦一條領袖「語錄」，順利背出則讓通行；否則，一邊學習去，直到能夠背誦出來為止。而我還記得另一件事：在小學算術課本中，在涉及到百分數的例題或者習題裏，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去年某印刷廠印領袖「語錄」（「選集」）多少本，今年敬印多少本，今年比去年的印數增加百分之幾十？

讓人十分感嘆的是，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收藏熱漸起，但我們家竟然一枚像章和「語錄本」都找不到了！所以，在看到我姨媽將那一包像章從衣櫥隔板下方取出的時候，我非常驚訝。當今天回首往事，我還有其他一些感嘆，比如說，並非胸前別上像章，就真的一定「無限忠於」，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事實上大有人在；「語錄本」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等等一條條「語錄」清楚地寫着，一個人會背，能背又怎麼樣？一些人在現實生活中所作所為甚至與之截然相反！

◆◆◆◆◆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已經定居揚州的姨媽回到家鄉，她在整理舊物的時候，從老式衣櫥的隔板下，取出了一包叮噹作響的東西：領袖像章。這些像章，大都是鋁質的，小的只有人民幣五分錢的硬幣那麼大，大的則有小飯碗口那麼大。瞅着後者，我有些吃驚，也有些羨慕。為什麼？因為再往前推差不多二十年前的時候，假如我能夠擁有這其中的一枚，那麼，必定會無限風光，成為衆人矚目的焦點。

「文革」初期，曾經有過一陣像章熱：無論男女老少，都以胸前能夠別一枚像章為榮。起初，金屬材料製作的領袖像章還很罕見，我母親單位有人因此而發明了拿牙刷的刷身磨平，拿小刀刻上「為人民服務」一類的字樣充作胸章，竟然也能時髦與風光；後來，金屬材質製作的領袖像章幾乎於一夜之間普及開來，牙刷製品自然再也無人光顧了。這時候的人們追求的是什麼？是更大的像章。而那些像章上的領袖頭像其實主要也就兩種：一種是領袖的側面頭像——應該是他六十開外時身着中山裝的頭像；另一種則是他老人家頭戴軍帽，「文革」期間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百萬紅衛兵的照片中的那個頭像。

讓人有些難以思議的是，那時候的人們的審美眼光高度趨同：都是以大為美。所以，有了人民幣五分錢硬幣大的像章以後，會積極追求藥瓶蓋子大的像章；有了藥瓶蓋子大的像章，又會努力追求小飯碗口大的像章。而因為似乎市面上很少大尺寸的像章出售，所以，一些人竟然採取了極端的方式攫取：搶。也就是當某人胸前佩戴着碩大的像章出現在公共場所如電影院、商店、街道上的時候，於不經意間可能有人從天而降，急速從你胸前「掠」走像章。同樣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那個年代的人們，似乎並不認為這是屬於犯罪性質的搶劫行為。或許大家的想法是，之所以「搶」，是因為「愛」；而愛偉大領袖，又怎麼能是罪行呢？

與那時人人胸前佩戴一枚大小不等的領袖像章相同的是，那時候的手一本領袖「語錄」。在那個塑膠製品還很少見的年代，「語錄本」早早地就穿上了漂亮的塑膠外套。我甚至直到今天一提起「語錄本」來，還能感覺到那「語錄套」的柔軟以及散發出的塑膠味。當然，「語錄本」上「副統帥」的「再版前言」也是我印象相當深刻的，記得它的第一節中，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推向頂峰」之句。而小冊子的第一條語錄，我記得它應該是這樣一條：「領導我們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當然，當年我記得的「語錄」絕不只是這一條，很多人，包括那些識不了幾個字甚至是純粹文盲的人，如工廠裏的工人，農村裏的社員等，能夠流利地背出其中不少「語錄」的也不在少數。為什麼？因為能不能背，背多與背少，據說與其政治立場和態度有一定的關聯的；還因為「文革」高峰時期，竟然有人發明了一個做法，以顯示自己的無限忠誠：攔在路上，讓過路人背誦一條領袖「語錄」，順利背出則讓通行；否則，一邊學習去，直到能夠背誦出來為止。而我還記得另一件事：在小學算術課本中，在涉及到百分數的例題或者習題裏，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去年某印刷廠印領袖「語錄」（「選集」）多少本，今年敬印多少本，今年比去年的印數增加百分之幾十？

讓人十分感嘆的是，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收藏熱漸起，但我們家竟然一枚像章和「語錄本」都找不到了！所以，在看到我姨媽將那一包像章從衣櫥隔板下方取出的時候，我非常驚訝。當今天回首往事，我還有其他一些感嘆，比如說，並非胸前別上像章，就真的一定「無限忠於」，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事實上大有人在；「語錄本」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等等一條條「語錄」清楚地寫着，一個人會背，能背又怎麼樣？一些人在現實生活中所作所為甚至與之截然相反！

◆◆◆◆◆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已經定居揚州的姨媽回到家鄉，她在整理舊物的時候，從老式衣櫥的隔板下，取出了一包叮噹作響的東西：領袖像章。這些像章，大都是鋁質的，小的只有人民幣五分錢的硬幣那麼大，大的則有小飯碗口那麼大。瞅着後者，我有些吃驚，也有些羨慕。為什麼？因為再往前推差不多二十年前的時候，假如我能夠擁有這其中的一枚，那麼，必定會無限風光，成為衆人矚目的焦點。

「文革」初期，曾經有過一陣像章熱：無論男女老少，都以胸前能夠別一枚像章為榮。起初，金屬材料製作的領袖像章還很罕見，我母親單位有人因此而發明了拿牙刷的刷身磨平，拿小刀刻上「為人民服務」一類的字樣充作胸章，竟然也能時髦與風光；後來，金屬材質製作的領袖像章幾乎於一夜之間普及開來，牙刷製品自然再也無人光顧了。這時候的人們追求的是什麼？是更大的像章。而那些像章上的領袖頭像其實主要也就兩種：一種是領袖的側面頭像——應該是他六十開外時身着中山裝的頭像；另一種則是他老人家頭戴軍帽，「文革」期間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百萬紅衛兵的照片中的那個頭像。

讓人有些難以思議的是，那時候的人們的審美眼光高度趨同：都是以大為美。所以，有了人民幣五分錢硬幣大的像章以後，會積極追求藥瓶蓋子大的像章；有了藥瓶蓋子大的像章，又會努力追求小飯碗口大的像章。而因為似乎市面上很少大尺寸的像章出售，所以，一些人竟然採取了極端的方式攫取：搶。也就是當某人胸前佩戴着碩大的像章出現在公共場所如電影院、商店、街道上的時候，於不經意間可能有人從天而降，急速從你胸前「掠」走像章。同樣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那個年代的人們，似乎並不認為這是屬於犯罪性質的搶劫行為。或許大家的想法是，之所以「搶」，是因為「愛」；而愛偉大領袖，又怎麼能是罪行呢？

與那時人人胸前佩戴一枚大小不等的領袖像章相同的是，那時候的手一本領袖「語錄」。在那個塑膠製品還很少見的年代，「語錄本」早早地就穿上了漂亮的塑膠外套。我甚至直到今天一提起「語錄本」來，還能感覺到那「語錄套」的柔軟